

寫作論叢

下 冊

.33
4

嘉 興 師 范 專 科 學 校 中 文 科 編

写作论丛

(下册)

嘉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

目 录

小 说

- 一、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 迅 (1)
- 二、我怎样写“春蚕”……………茅 盾 (5)
- 三、谈《家》……………巴 金 (10)
- 四、短篇小说我见……………沙 汀 (18)
- 五、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周立波 (23)
- 六、生活 人物 故事……………艾 芜 (30)
- 七、《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 (45)
- 八、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王愿坚 (56)
- 九、《草原上的小路》的创作及其他……………茹志鹃 (70)

散 文

- 十、谈散文……………曹靖华 (85)
- 十一、《东风第一枝》小跋……………杨 朔 (88)
- 十二、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秦 牧 (89)
- 十三、关于散文的立意……………萧 殷 (97)
- 十四、写真情实感……………吴 伯 箫 (101)

诗 歌

- 十五、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 (103)
- 十六、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臧克家 (114)
- 十七、关于诗歌创作的一封信……………郭小川 (122)

- 十八、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 青 (127)
十九、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李 季 (134)

戏 剧

- 二十、我怎样写五幕历史剧《屈原》……………郭沫若 (140)
二十一、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
 的创作……………朱 青 (146)
二十二、关于话剧《王昭君》的创作……………曹 禺 (154)
二十三、“龙须沟”写作经过……………老 舍 (158)
二十四、《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贺敬之 (160)
二十五、关于改编的若干问题……………夏 衍 (167)

报告文学

- 二十六、谈报告文学……………徐 迟 (184)
二十七、给人民作一个通信员……………刘白羽 (198)

一九八〇年四月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 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介绍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r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

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但他称我为stylist（编者按：英语，意为文体家）。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

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媧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得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当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

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1933年）

录自《南腔北调集》

我怎样写“春蚕”

茅 盾

《青年知识》的主持人写信给我，希望我写一点所谓创作经验，并出了一个题目：我怎样写“春蚕”。老实说，在什么创作经验一类的题目上，如果我还有什么值得记下来的，那就早已写过了，除此而外，委实别无新的经验。可是，《青年知识》既然叫到了我，看来是不能够交白卷的了。一时之间自己也想不出别的题目，那就来谈谈我怎样写“春蚕”罢。

我不敢冒充是农家子，从我能听会说的時候起，见闻范围确也相当复杂，但从没在农村生活过。我幼时的大家庭是在一个十万人口的大镇（据一九三五年卢氏新修镇志），我家（自曾祖以来）并不务农，也不是地主，我幼年所见的乡下人不出下列二类，家中佣人（女的居多）以及“丫姑爷”。我家有几代的“丫姑爷”常来走动，直到我们的大家庭告终。童年时代，一年一度，我可以到乡下去一趟：这就是清明上坟。老实说，我那时并不喜欢乡下：我觉得乡下所有的，镇上都有，——镇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镇上所有的，例如各种新奇的洋货，其中包括留声机和西洋镜，乃至走江湖的各种杂耍，乡下却都没有，乡下确比镇上单调得多了。

我的母亲也是镇上长大的，她对于农村生活的情形也不会比幼小的我知道得多些，她也不大讲农村的情形。常和我家来往的亲戚世交也没有来自农村的，当然也不会讲到农村

了。我幼年的环境就是这样与农村无缘的。十五岁以后，我离开故乡，进中学，二十以后，为了职业之故，长住上海，那自然和农村更加离开得远了。

这些生活环境上的限制，使我不敢写农村，而只敢试试写“春蚕”；——这只是太湖流域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农村中的一个季节。而为什么竟敢写“春蚕”呢？亦自有故。

童年时代我的大家庭中的角色（我的长辈），只有一位是和农村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我的祖母。她是地主的女儿。祖母常常讲起她出阁以前的一个笑话：那时她家有个什么人故世了，我家送了礼去，礼单上有一项是“楮一千担”，照我们镇上的风俗“楮”是冥纸一类的东西，普通以十担为单位，约如一包火柴的大小，“一千担”者亦不过一百包火柴那么大小一堆而已。但祖母的家乡（离我家乡约五十里），没有这风俗，所以当时她家的管家一看礼单上有一千担楮，就叫道：“那倒要多喊几个长工去搬呢！”祖母是喜欢讲这笑话的。当她向我讲这笑话时，她娘家的侄儿们（我的表叔们）虽然有不少位早已到日本学法政了，其“洋气之足”实远过于我家，可是留在祖母记忆中的，依然是太平军以前的农村风光。而对于春蚕，她尤其有兴趣。当我童年之时，接连有两三年，祖母自家养蚕，不过只十来斤“出火”而已，当然是玩玩的性质，但因家里人都不在行，倒底也临时找专门女工来帮忙。我对于养蚕的知识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家对于蚕特别有好感。我的母亲也喜欢养蚕玩儿。大概因为母亲的外祖父家是丝商，女人们也常以养蚕为一消遣，母亲是从小看惯了的缘故。直到后来我们住在上海了，母亲还象作实验似的每年养百把条蚕，而我的孩子们则在香烟盒内养十几

条蚕，居然每条都作了茧子。

养蚕离不了桑叶，我对于桑的知识却由来已久。上面说过，我的故乡虽然是十万人口的大镇，可是市街之外就有桑地。我幼年在故乡进高等小学，那高等小学的围墙外就有一片桑林；我到外祖父家去，就必须走过一段两旁全是桑林的街道。每年蚕季，在我们镇上就有“叶市”，这是一种投机市场，多头空头，跟做公债相差无几。而我家的亲戚世交有不少人是“叶市”的要角。一年一度的紧张悲乐，我是耳闻目睹的。

这种操纵桑叶价格，剥削农民的“叶市”，到我写“春蚕”的时候，依然存在；可是另一种新的东西却早又发生而且业已过了全盛时期，正跟着“厂经”（机器缫的细丝）外销之衰落而走上了下坡路——这就是茧行。以我所知，在浙江嘉湖一带的茧行是有组织的；它们成为若干集团，每集团有其势力范围（呈准官厅，二十里内不得有新茧行开设），而这些集团又订有互助协定，操纵茧价，一致行动。茧行是剥削农民的第二关，因为它资本雄厚，组织严密，比“叶市”更可怕些。我认识不少干“茧行”的，其中也有若干是亲戚故旧。这一方面知识的获得，就引起了我在写“春蚕”的意思。

至于故事本身，平淡无奇：当时浙江一带以养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村，差不多十家里有九家是同一命运的。

太湖区域（或者扬子江三角洲）的农村文化水准相当高。文盲的数目，当然还是很多的。但即使是一个文盲，他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的事物。通常的看法总以为这一带的农民比较懒，爱舒服，而人秉性柔弱。但我的看法却不然。蚕忙、农忙的时期，水旱年成，这一带农民的奋斗

精神和组织力，谁看了能不佩服（我写过一篇“速写”，讲到他们如何有组织地和旱魃斗争的，这完全是事实）。抗战初年，上海报上登过一段小新闻，讲到北方某地农民看到了一个日本俘虏就大为惊奇，说：“原来鬼子的面目和我们的面目一模一样！”可是在我们家乡一带的农民们便不会发生这样的惊异，他们早就熟知“东洋人”（不叫鬼子了）是何等样的面目，何等样的人。一九三零年顷，这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的高潮。农民的觉悟颇可惊人。诚然，在军阀部队“吃粮”的，很少这一带的农民，向来以为他们“秉性柔弱”的偏见，大概由此造成。可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一带的工业能吸收他们。事实早已证明，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是能够斗争、而且斗争得颇为顽强的。

这是我对于我们家乡一带农民的看法，根据这一理解，我写出了“春蚕”中那些角色的性格。

自然，在描写那些角色的个性时起作用的，也还有我比较熟悉的若干个别农民。上面说过，我未尝在农村生活过，我所接近的农民只是常来我家的一些“乡亲”，包括了几代的“丫姑爷”，但因为是“丫姑爷”，他们倒不把我当作外人，我能倾听他们坦白直率地诉说自身的痛苦，甚至还能听到他们对于我所抱的理想的质疑和反应，一句话，我能看到他们的内心，并从他们口里知道了农村中一般农民的所思所感与所痛。

总结起来说，春蚕构思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

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有苛捐杂税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了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它和茧行也常常是一体）操纵叶价，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我写小说，大都是这样一个构思的过程。我知道这样的办法有利亦有弊，不过习惯已成自然，到现在还是如此。

《青年知识》既然出了这个题目，我就拉拉杂杂写完了卷。这或者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不敢说这就是正当的唯一法门。生活经验的限制使我不能不这样在构思过程中老是从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开始。

（转录自1945年出版的《文萃》

第一年第八期）

谈 《家》

巴 金

有许多小说家喜欢把要对读者讲的话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发表意见。我大概属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中都有我自己写的“序”或“跋”。有些偏爱我的读者并不讨厌我的唠叨。有些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的人甚至好心地写信来探询他们的下落。就拿这部我在二十六年前写的《家》来说罢，今天还有读者来信要我介绍他们跟书中的人通信，他们要知道书中人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新中国的光明才放心。二十年来读者们常常来信指出书中的觉慧就是作者，我反复解释都没有用，昨天我还接到这样的来信。主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希望这个人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同享今天的幸福。

读者的好心使我感动，但也使我痛苦。我并不为觉慧惋惜，我知道有多少“觉慧”活到现在，而且热情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然而觉新不能见到今天的阳光，不能使他的年轻的生命发出一点点光和热，却是一种使我非常痛心的事。觉新不仅是书中人，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二十六年前我在上海写《家》，刚写到第六章，报告他自杀的电报就来了。你可以想象到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完这本小说的。

我很早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不是为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

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看见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象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憎恨和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姐（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罢。”一直到我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要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的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出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出这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级阶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我可以这样说，我熟悉我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因为我在那样的家庭里度过了我最初的十九年的岁月，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也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然而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写了一般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川西盆地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是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

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他们甚至有“为祖先赎罪”的想法。今天长一辈的已经死了；下一辈的连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年轻的一代中有的为中国革命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有的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者。然而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这就是《家》的年代），虽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爱国热潮使多数中国青年的血沸腾，可是在高家仍然是祖父统治整个家庭的时代。高老太爷就是封建统治的君主。他还有整个旧礼教作他的统治的理论根据。他是我的祖父，也是我的一些亲戚的家庭中的祖父。经济权捏在他的手里，他每年收入那么多的田租，可以养活整整一大家人，所以一大家都得听他的话。处理年轻人生死的大权也捏在他的手里。他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想不到年轻人会有灵魂。他靠田租吃饭，却连农民怎样生活也弄不清楚。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庭过得富裕、舒服。他相信这个家是万世不败的。他以为他的儿子们会学他的榜样，他的孙子们会走他的道路。他并不知道他的钱只会促使儿子们灵魂的堕落，他的专制只会把孙子们逼上革命的路。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亲手在给这个家庭挖坟。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又来毁坏这个家业。他至多也就只做到四世同堂的好梦（有一些大地主家庭也许维持到五代）。不单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爷们全走着这样的路。他们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盖着多少倾轧、斗争和悲剧。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但是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毕竟冲出去了，他们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时给快要闷死人的家庭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

我的祖父虽然顽固，但并非不聪明，他死前已经感到幻灭，他是怀着寂寞、空虚之感死去的。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觉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时候，我的五叔以一个“小偷”的身份又穷又病地死在监牢里面。他花光了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一切，花光了他的妻子给他带来的一切以后，没有脸再见他的妻儿，就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这个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说中没有写到：他面目清秀，能诗能文，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可是封建旧家庭的环境戕害了他的生机，他只能做损人害己的事情。为着他，我后来又写过一本题作《憩园》的中篇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我早把《家》写出来，他也许会看见了横在他面前的深渊，那么他可能不会落到那里而去。然而太迟了。我的小说刚刚开始在上海的《时报》上连载，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杀了。十四年以后我的另一个哥哥在上海病故。我们三弟兄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我说过好几次，过去十几年的生活象冤一般压在我的心上。这梦冤无情地摧毁了许多同辈的年轻人的灵魂。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象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内容浅薄而且有抄袭嫌疑的文章，我不能说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但是我牢牢记住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三个大胆在那种环境里意外地收到了效